

中心-边缘理论视域下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以仪陇县“景区带村”模式为例

岳奎 何纯真¹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建构有效的脱贫长效机制，是新时代扶贫脱贫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通过运用中心—边缘理论对仪陇县旅游扶贫实践工作分析可以发现，该地区的“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在打破景村空间界限、业态界限和利益界限的基础上，实现景区、村庄和村民三方的良性互动发展，并形成了从离散走向均衡的空间互应机制、从景区一元化走向景村多元化发展的合作对接机制，以及从政治性为主向政社共利转变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构成了解决脱贫的长效机制。当前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应当结合三重长效机制，以规划为引领，有序推进景村联动发展，还应注意在实现利益分配均衡的基础上推动多主体合作，从而构建规划先行、多元融合和利益有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心-边缘理论 旅游扶贫 景区带村 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1）08-0071-0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脱贫成效，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1] (p4-12)}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旅游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成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扶贫监测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0.4%，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123元。¹尽管旅游产业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扶贫的长效性。可持续旅游减贫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前，学界关于当前旅游扶贫面临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从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研究。如孙兆霞认为政府主导下的以行政路径依赖为运作机制的产业扶贫项目，因脱嵌于村庄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扶贫目标扭曲、贫富差距拉大和村庄公共性消解。^{[2] (p14-21)}梁栋等指出部分基层政府以政绩为导向，使得规模化的亮点产业容易牵制和分散专项扶贫资金的用力方向，从而有损产业的经济绩效，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在政绩压力下也会被后者无形俘获。^{[3] (p49-57p164-165)}针对这一困境，郭小聪等认为既要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也要弱化形式化的考核内容在扶贫考核绩效中的证明作用，防止政策“空转”造成“脱节”。^{[4] (p33-39)}马良灿指出扶贫工作要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元参与社会化运作机制转变，可以适度给基层政府产业扶贫工作权限，加强各主体利益联结，建立风险共担机制。^{[5] (p10-14)}

二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研究。如黄国庆认为现有的旅游扶贫模式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益，缺乏对扶贫目标的统筹考虑，尤其是缺少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注。^{[6] (p253-255)}荀丽丽指出大量扶贫资金的资本化运作使贫困者日益成为悬浮于政策过程之

¹作者简介：岳奎（1980-），男，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纯真（1994-），女，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地方干部激励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19CDJ015）；“习近平总书记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研究”（18BDJ085）阶段性成果

外的抽象存在，农业产业项目也愈益脱嵌于乡村社区，产业扶贫项目的“在地性”困境尤为突出。^{[7] (p82-88)}对此，蒋永甫等提出要创新扶贫方式，在政府正确引导下形成“政府扶龙头—龙头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扶贫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双赢。^{[8] (p148-154)}于乐荣等认为要在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中与贫困户形成利益联结，关注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积极培育内源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9] (p6-12)}

三是从贫困人口参与的视角研究。如许汉泽等认为产业扶贫实践中容易出现贫困户参与能力不足、扶贫主体缺失与目标异化以及农户市场化困境等问题。^{[10] (p130-136)}侯昭华等指出忽视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主体性认知，仅从扶贫干部的角度与项目运营层面出发，使得贫困户面临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资源贫乏、抵御风险能力差，从而产生“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11] (p44-51)}对于这一问题，胡振光等提出要从把握各主体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参与能力，激发参与动力，突破参与障碍。^{[12] (p69-107)}李小云等指出重视贫困群众人力资本的提高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既要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对接市场的能力，也要通过组建由农民自己管理的合作社形式培养村民自主管理能力。^{[13] (p8-14p161)}

既有的研究从多个层面分析了旅游扶贫后续发展的问题，为把握其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提供了多重视野，也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尽管部分学者对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业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还缺乏对多元主体之间互动参与的系统性论述。本文结合中心—边缘理论，对川陕革命老区贫困县仪陇县旅游扶贫进行经验考察，分析仪陇县旅游扶贫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探讨旅游景区在开发建设中是如何与村庄和贫困人口进行良性互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其他相关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二、案例选择：四川省仪陇县“景区带村”的脱贫实践范例

仪陇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和作为为人民服务光辉典范的张思德同志的故乡，也是革命老区贫困县和秦巴山区国家新一轮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朱德故里核心景区总面积约 5.6 平方公里，位于马鞍镇琳琅村朱家大湾，属于原生态开放式景区。景区核心区域涉及 5 个村 32 个村民小组（农户 1167 户，4168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7 户 160 人），其行政管理权由原属乡镇主体规划为景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实行“区村统管”，履行乡镇管理职能。该景区于 2016 年荣获全国首批“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2018 年，核心景区内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产业获得的收入人均约为 2367 元，占其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为 82%。区外贫困户人均旅游经济收入为 1368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60%以上。景区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7%下降到 2018 年的 0.36%，带动周边 1.1 万户 3.34 万人脱贫。全县旅游扶贫涉及农村人口年纯收入达到 17000 元以上，平均每年提供 600 个以上直接就业机会，创建了省级乡村旅游特色小镇 1 个、特色精品村社 1 个、旅游扶贫示范村 2 个、精品特色乡村旅游经营店 2 个，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增收贡献率达到 35%以上。²

2014 年，该县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开发一个景区，致富一方百姓”为目标，以“景区带村”模式为抓手，以发展特色长效产业为重点，借助朱德故里核心景区的客源市场，发挥扩散效应，向周边贫困村引入旅游资源和扶贫资源，以此形成贫困村脱贫的原动力。在此过程中，贫困户作为旅游扶贫的参与主体，受惠于产业发展，实现了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在旅游扶贫的助推下，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于 2018 年顺利脱贫摘帽。该县的脱贫经历和经验，主要呈现出景区、村庄和贫困户三元互动的显著特征，并且凸显出均衡互动、合作对接和共利共生等长效脱贫效应，这为我们打造有效的旅游脱贫模式、构建有效的长效脱贫机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有益经验。基于此，笔者于 2019 年 6-7 月以仪陇县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开展驻村调研，调研范围为仪陇县朱德故里景区及周边村庄，调研对象包括县级领导、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以及村民等，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对当地的旅游扶贫工作进行深入了解，并获取了大量办公文件、旅游扶贫项目书、汇报资料和访谈记录等，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四川省仪陇县“景区带村”实践所蕴含的长效脱贫机制奠定了实证基础。

三、分析视角：中心—边缘理论及其与实践范例的内在契合

加尔通在《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中指出：“世界由中心国和边缘国组成，每一个国家内部也都同时存在着中心和边

缘。”^{[14] (p81-117)} 中心—边缘理论作为一个概念、理论或分析视角，在国际关系、文化产业和社会治理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5] (p375-395)} 并且形成了泛用性较强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分析范式。其中，“中心”和“边缘”的划分并不局限于地理空间区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状态，这使得中心—边缘这一分析视角得以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研究之中，更使其具备了分析作为经济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精准脱贫的内在条件。在早期研究中，依附论研究下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强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关系，但是并没有看到实质关系外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潜力和动力，力求创造双赢的局面，这使得该视角在探讨当下经济与社会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分析力。随着中心—边缘理论的深入发展，中心—边缘结构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契合治理思潮的“多元互动”“信任互惠”和“合作共赢”等核心价值理念和关键治理要素，后续的中心—边缘理论观点更加强调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互动、合作、共赢，以及相互依存乃至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这使得中心—边缘理论更加适用于探析和型构全球治理思潮下经济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模式。如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中指出，中心—边缘结构存在弱化的变动趋势，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形式。“资源在体系内的全方位流动，会使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距缩小，边缘逐渐消失，一体化的空间得以形成”。^{[16] (p14)} 由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支配和依附关系转变为动态协同和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开展合作和交流，力求共同发展，而非制造二元对立、彼此冲突。学界对中心—边缘结构转向的深入认识，对于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相关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中心—边缘结构转向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中心对边缘的支配转向中心与边缘的动态协同。个别区域在早期发展中取得优势地位，并伴随着优势资源的集聚不断扩大，逐渐在技术水平、资本、人口等方面超越其他区域，成为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中心区，其他区域则由于发展滞后成为边缘区域，并受中心区域的约束和支配，造成边缘区域不断地向中心输送劳动力、资源和资金，中心区域的优势最终演变成对边缘区域的强势，这样就形成了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17] (p6-7)} 由此可见，中心区域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区域资源抽取基础上的。但是在这种单核心的结构模式中，中心区域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也会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因此，需要通过发展中心，带动边缘，加强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而实现一个区域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演变成相互关联、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其次，边缘对中心的依附转向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依存。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关系生成于人类的第一次“脱域化”³ 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制度的生成都是为了强化这一不平等的结构，边缘区域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于中心区域，由此形成了边缘对中心的强迫性、单向性依附，同时也是因为单向性依附的存在，导致边缘区域的长期贫穷和落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带来了第二次“脱域化”运动，资源的高速流动冲破了原有的划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再具有高低之分，差异成为合作的理由并诱发为合作行为，区域之间的支配和依附关系演变成合作关系。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即中心区域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担负起最高或最终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命。区域与区域之间，也都变为网络上的纽结。因此，“这种结构仅仅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中心—边缘结构被解构了。这是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中心的网络图景”，^{[18] (p87-93)} 单向性的依附被瓦解的同时，双向性、多向性的相互依附关系建立起来，多元主体的地位更为平等，相互依存、多元共生的关系模式渐趋清晰。

总的来说，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和边缘对中心的依附是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差异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资源的流动和多变，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会变得模糊，逐渐发展为动态协同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最终会出现区域一体化发展，整个社会将呈现“去中心化”的图景。在“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中，“发展成熟的景区处于中心区域，成熟景区边缘或内部的村庄，依托核心景区的客源以及乡村特有的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村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旅游服务，从而带动贫困村脱贫致富”，^{[19] (p46-51)} 这种景区、村庄、村民等多元主体间动态协同、相互依存的“中心—边缘”互动模式，与中心—边缘理论的转向结构存在高度内在契合，中心—边缘理论无疑可以为深入探析四川省仪陇县“景区带村”的脱贫实践案例提供有效的分析视角与框架。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景区带村”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如何实现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和贫困人口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发挥“带”的作用，关乎扶贫工作的长效性，也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如图 1）。因此，分析厘清“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所蕴含的长效机制，是本文基于中心—边缘理论进行分析的重中之重，笔者将以此为轴心，对“景区带村”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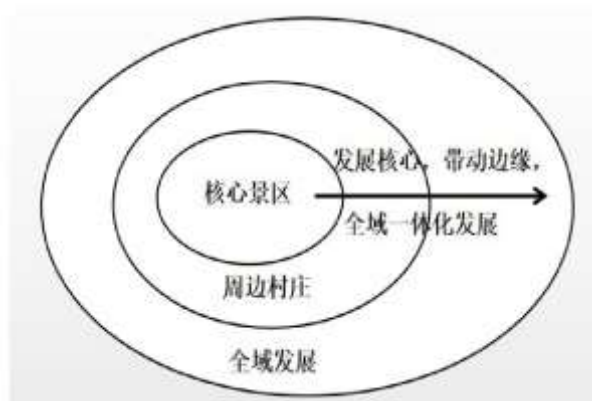


图 1 旅游区域发展“中心—边缘”理论模型

四、仪陇经验：“中心—边缘”视角下“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

一个模式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在于它能否解决共性问题。仪陇县“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之所以取得了显著成效，关键在于结合区域特色优势形成了一系列长效机制创新，这可以说是该模式贡献出的“仪陇经验”。该经验的核心思路，是打破“中心—边缘”束缚，实现“中心—边缘”互动、融合与共生，将旅游景区、周边村庄和贫困人口有机整合起来，实现多元主体高效联动发展。具体来说，则主要是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促使核心景区和周边村庄发生空间关系上的互应，实现景区与周边村庄从离散走向均衡；突破从单方面靠景区各种旅游资源要素的“强输入”转向景区与周边乡村旅游在资源、市场、产品等方面的合作对接，实现从景区一元化向景村多元化的转变；打破中心与边缘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参与主体利益分配不平等，构建以贫困群众为主体的帮扶模式，带领贫困群众走上产业致富路，实现从政治性为主向政社共利的转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中心—边缘”视角下的“仪陇经验”明晰为三大长效机制，以期更为清晰地展现“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经验。

（一）空间互应机制。

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格局和形态。从乡村旅游发展阶段来看，景区与周边村庄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为初期的散点式、中期的直线式再到后期的网格式。仪陇县在实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之前，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之间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性，景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没有大范围地流入周边村庄。这一时期，由于无规划发展和缺乏村民参与，景区与周边村庄之间是两个孤立发展的系统，周边村庄散点式地分布在核心景区周围，旅游资源、要素和旅游活动都集聚在核心景区内部。在核心景区集聚力的影响下，造成了区域旅游的极化现象，从而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异质性。

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仪陇县通过创新“景区带村”模式，促使景区与周边村庄发生空间关系的联动，初期散乱的分布格局逐渐变得有组织化，景村之间实现了由点到线的连接。“景区带村”模式开始实施阶段，为了使周边村庄也能享受到旅游景区的服务，地方政府在扶贫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对周边村庄土地资源进行了空间优化配置，促进景区与村庄两种不同的社会表现形式在同一空间区域的和谐发展。当地政府先后投资 4.6 亿元对核心景区和周边村庄的道路、自来水、天然气、视讯、住居等旅游及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同步建设，完成道路 46 公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3 处、沼气池 1600 多口、水电气视讯管网 60 多公里，整治农房 800 多座。景区内 1605 户 5385 名群众及景区外 9512 户 28063 名群众（其中贫困户 1326 户 4563 人），都通上了便民路、喝上了干净水、用上了天然气。⁴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在地域上的互通有无，也带动周边村庄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使得景区与村庄由原来互不联系的孤立系统在空间上连接起来，打破了之前离散式的发展状态。这一时期，虽然部分周边村庄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开始发展旅游业，但主要还是为核心景区提供配套的旅游服务，如农家乐、住宿等，尚未形成稳固的产业链和横纵向联系。区域内的旅游目的地只有朱德故里景区一个核心点，它的辐射范围也仅限于核

心景区所辖的行政区划范围内。

为带动周边更多的贫困村脱贫，县政府对旅游扶贫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按照“重点打造，以点促面，辐射带动”的旅游扶贫发展思路，将朱德故里景区带动周边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推动了周边村庄与景区在空间关系上构建起网状共生式结构。2014 年，仪陇县在对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进行了空间规划和设施建设之后，一方面打通了景区内外阻碍旅游资源要素流动的瓶颈，景区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定向流入周边村庄，为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在遵循协调性、互补性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挖掘景区周边村庄的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构建了四大旅游发展片区，分别是：以险岩村为核心的田园农耕体验片区、以琳琅村为核心的名人遗迹展示片区、以马鞍老街为核心的客家及本土民俗文化展示片区、以金山湖为核心的湖泊休闲度假片区。由此，旅游地空间范围逐渐扩大，旅游景点逐渐增多，不同景点之间在市场需求力、政府拉动力等各种推动力的作用下发生频繁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多核心相互交织的区域旅游网络系统。这一时期，景区和周边村庄实现了组合式发展，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核心景区和周边村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核心景区极化聚集作用对扩散作用的影响，即极化作用在增强核心景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的扩散作用也随之增强。不仅核心景区有自己的影响范围，与外围产生更多的交流，而且景区与村庄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也形成了互相影响的网络体系（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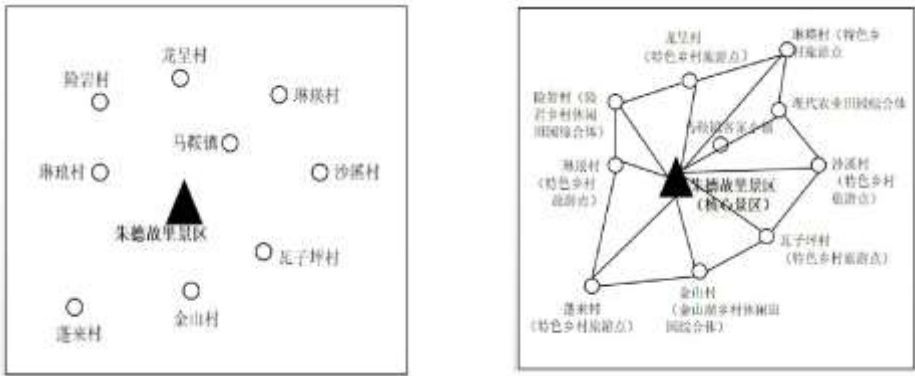


图 2 “景区带村”模式实施前后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的空间关系对比图

综上所述，在核心景区的辐射带动下，离散的村庄个体突破空间限制，获得与核心景区交汇的机会，推动了后续空间渗透，最终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的状态。一方面，扶贫资源和旅游资源的注入给景区周边村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促使周边区域范围内农村社区的设施环境条件不断改善，服务旅游景区的功能也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周边村庄根据其空间发展的最优条件主动或被动进行调整，利用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最大程度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在此基础上，两者在空间上实现了协调整合。

（二）合作对接机制。

旅游地之间加强联系，进行竞争性合作，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核心景区在带动周边乡村发展旅游业之后，需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内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增强双方在旅游产品、形象和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对接。仪陇县在实施旅游扶贫之前，当地以发展单一的红色旅游景点为主，景区周边村庄产业发展依靠传统农业和养殖业，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人口外流严重；村庄人居环境水平也有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不佳，整体风貌较差；周边村庄虽紧靠核心景区，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仅作为一个普通的过路村存在；村里尚存的一些农家乐、旅馆等服务设施，存在普遍服务水平低、收益不高等问题。在景区一元化的发展模式下无法有效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景区之间双向流动并相互融合，资源要素流动不畅和生产要素交换的不平等制约了景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造成景区内外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指导下，仪陇县改变朱德故里景区一元化的旅游发展模式，构建乡村产业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实现了景村一体化发展。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金和项目支撑。县政府在编制《仪陇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总体规划》基础上，先后编制了《仪陇县旅游扶贫开发总体规划》《仪陇县十三五旅游扶贫规划》《朱德故里景区带动精准脱贫实施方案》等多项规划，促进旅游扶贫规划与相关规划、国家政策的有效衔接。此外，通过逐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拓宽了扶贫资金来源渠道，指导旅游扶贫工作实现了有序高效推进。截至2018年，该县共编制旅游扶贫项目57个、资金投入18.6亿元。在资金使用上，重点支持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将旅游扶贫项目总投资的六分之一用于核心景区创建，总投资的六分之五则用于打造周边精品特色乡村旅游。⁵

二是科学定位市场，实现错位发展。仪陇县根据周边乡村资源禀赋和民俗文化的差异，以朱德故里景区为龙头优化整合各类资源和项目，引进和培育民间工艺、传统文化、劳动体验和高科技农业等项目，将周边村庄特别是贫困村作为景区休闲、观光和民宿文化体验承接区打造，形成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俗旅游的现代旅游发展新模式，现已构建了“琳琅山—马鞍镇区—乡村”景镇村一体化发展示范带，并形成了鲜明的模式特色，主要包括：一核，即朱德故里—琳琅景区旅游核；一环，即环镇区乡村旅游环；两大主题引擎产品，即客家文化小镇和三星寨—关刀山体育运动山体公园；三大特色田园综合体，即险岩乡村休闲田园综合体、金山湖乡村休闲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多个特色旅游点，即围绕核心、主题引擎产品、旅游环打造众多不同特色的旅游节点的全域旅游格局，推动了景村错位发展，融合互补。

三是旅游产品开发上以核心景区产品开发为主，周边村庄产品开发为辅。通过优化组合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将差异化产品作为统一的旅游名片进行对外宣传推广，发挥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产品之间的互补和协作功能，从而提高区域旅游吸引力。在营销理念上，由营销旅游产品向营销红色旅游度假节庆活动为突破口；由营销山地旅游资源向营销旅游度假休闲品质生活转变；由营销琳琅山景区品牌向营销红色旅游度假目的地的整体品牌转变。

总的来说，在扶贫政策推动下，核心景区不再只是旅游资源的集聚地，而是承担着扶贫资源供给者的角色，依托其成熟的旅游吸引力为周边乡村旅游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周边乡村也借助这一机遇，与核心景区在旅游业上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关系。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核心景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向周边村庄扩散联动的步伐，推动核心景区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帮助了周边村庄进行开发建设，形成后发优势，为周边村庄的发展注入内生动力。此外，景区带村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不是通过“强输入”的方式让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实现短期快速的脱贫目标，而是通过双向互动的方式构建核心景区与周边村庄旅游合作对接机制，促进客源从核心景区向周边村庄，尤其是向贫困村流动，从而实现了贫困村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利益分配机制。

由于红色旅游的特殊性，朱德故里景区开发建设初期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侧重于政治教育的传承和发扬。地方政府作为红色景区开发建设的关键行动者，在景区建设过程中未充分考虑村民强烈的经济利益诉求，出现红色旅游项目把村民排斥在外、村民缺乏融入红色旅游的载体等问题。尽管部分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村民在景区开发初期就获得参与旅游经营的机会，从事农家乐、住宿、销售旅游商品等活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经验，但由于旅游经营的门槛高，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众缺乏经营条件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难以有效参与旅游业，被隔离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之外。“在这种不平等结构中的参与协商与精英所惯常使用的科学理性功能一样，都只是维护中心利益的一种工具”。^{[20] (p99-107)} 基于此，地方政府认识到消除景区内的贫困需要协调好景区与村民的利益关系。通过创新扶贫方式，仪陇县建立了有景区参与的政府主导、多方协助的旅游扶贫合作推进机制，保障了贫困群众在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实现了政社共利。

一是构建景区与村民“股权获利”帮扶模式，着力培育增收致富产业。通过“旅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组建“民宿合作社”。景区在旅游信贷通、农村危房改造、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等多项政策的扶持下，深入实施“旅游+产业联盟”战略，并结合地方特色，与相关企业合作，着力打造度假主题村落，辐射推动民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发展；积极开发“农家

乐合作社”经营模式。在家庭承包基础上，立足当地农业资源优势 and 主导产业，坚持“民办、民营、民受益”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以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为目标，建立同类农家乐经营服务的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该类合作社具有合作化治理特征，不同于在公司和大户控制之下的合作社，农民在合作社中具有股东的主体地位，且合作社中的一部分骨干领导由能力素质全面的农村精英担当，以农民自治的形式强化合作社的可持续性；此外，为拓宽扶贫产业培育渠道，还组建“水果产业合作社”和“旅游产品经营合作社”等。按照“景区规划栽植，农户管理获利”的原则，在旅游通道两侧栽植水果，共栽植 1500 多亩柑橘、枇杷等水果，年产量约达 30 余万斤，人均增收达 300 余元，景区内贫困村玉兰村四社的贫困户许文 2018 年仅柑橘收入就达 2 万余元。通过培育扶贫产业，既美化了环境，丰富了景区业态和产品，又给农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实现了以地生财，有效推动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截至 2018 年，景区内的旅游合作社共吸纳 294 户贫困户入社，每户通过土地出租、资产入股、保底分红、就业挣酬和效益分成实现年收入 2.5 万元以上，保证了农民持续稳定增收。⁶

二是构建景区与村民“扶持帮扶”模式，搭建就业增收平台。由于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异，景区在精准识别前提下采取不同的受益方式，通过直接或间接带动让贫困户参与旅游产业。景区每年从财政收入中安排 8% 的资金帮扶贫困群众，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实施救助帮扶工程。对在景区发展花卉、果蔬等种植业的 43 户贫困户，每户提供 1 万元扶持周转金、协调 5 万元小额贴息贷款；对托底安置贫困户专门设置“公益劳动岗位”，优先支持贫困人口、大学生务工就业，先后解决贫困群众 287 人、贫困大学生 15 人直接就业，间接就业 1.6 万余人，其中贫困群众 4000 余人；对发展农家乐、民宿、农家超市的 61 户贫困户采取统一规划、业主自建、部门一对一精准帮扶方式，每户落实 3 万~5 万元的帮扶资金。现建成的 230 多个农家乐和乡村民宿中，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以上。景区内贫困村村民陈琼，通过开办“琳琅人家”农家乐，2016 年经营收入达 10 万余元，还帮助解决了 4 名贫困村民就业问题；景区每年组织开展旅游从业技能培训，落实每个岗位培训补贴 300~800 元，仅 2018 年就组织 1800 余人次开展了技能培训。⁷在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景区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由上可知，消除贫困现象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安排，对公平进行合理分配和对权力进行分享，以分解阻止部分范围人群与其他人平等身份参与活动的制度化障碍。^{[21][616]}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保障贫困人群在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在对景区和村庄中参与旅游产业的利益主体明确权责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协调好景区与贫困群众之间的关系，建立以贫困群众为主体的利益补偿和分配机制，从而确保贫困群众通过参与旅游业获得经济收益。

五、总结与讨论

在传统“中心—边缘”理论视野中，贫困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心与边缘的不平衡和不对称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后果，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资源下沉，在某些方面打破了中心与边缘原有的不平等结构。本文以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关系作为分析视角，对仪陇县“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进行了机制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仪陇县“景区带村”模式从表面上看是核心景区带动周边贫困村脱贫，但本质上是打造景区、贫困村与贫困户的命运共同体，即打破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和流动壁垒，实现中心与边缘的动态协同和相互依存，不仅是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利益协调和平等合作的有效途径，更将各方引导向协同共生的重要方式。笔者认为，仪陇模式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是在国家扶贫政策指引下，要求核心景区承担扶贫资源载体的作用，不断发挥其扩散和联动效应，带动周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二是周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也积极抓住这一机遇，不断寻求与核心景区的契合点，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形成旅游资源互补。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周边村庄获得与核心景区统筹发展的机会。三是“景区带村”旅游扶贫模式的实施，打破了传统旅游开发模式下弱势边缘群体的利益被侵占，景区与有优势条件的村民成了旅游发展中最大受益者的这种失衡结构。通过拓宽贫困人口旅游参与的渠道，精准落实帮扶举措，从而实现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共享旅游成果。

仪陇经验以推动从景区带村脱贫转向实现景村联动发展为中心，来建构旅游扶贫的优化路径。这一实践探索的价值不仅在于取得了显著的产业发展和脱贫增收的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为实现旅游脱贫长效性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路径。从仪陇模式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经验：一是要以规划为引领，有序推进景村旅游联动发展。联动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高级形态，不可能一蹴而

就，必须结合不同区域、不同领域联动发展的基础，以规划为指引，明确发展定位和功能布局，分区域、分领域有序推进，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确保旅游扶贫工作落实。从区域看，按照以点带面、依次推进的原则谋划景村联动发展的圈层结构，推动形成旅游片区，实现联动发展格局。从领域看，根据不同领域的联动发展条件差异，分层次统筹推进，对已经具备良好旅游条件的村庄，要加快推进联动发展，对尚未具备发展旅游业的村庄，要注重融合、联通、协调和互动，不断缩小发展差距。

二是在利益分配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多主体合作。景村旅游产业合作必然存在多种利益表达，具有优势资源的主体成为利益表达的中心，而弱势主体则处于利益表达的边缘。由于各利益主体存在着“自我价值判断”，利益诉求易向中心主体倾斜，而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均。如何处理旅游扶贫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利益协调问题，形成有效的区域治理结构是实现景村联动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景村多主体合作交流过程中，应将治理主体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激发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农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治理力量，尤其要关注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来保障农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利益。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2]旅游产业在为脱贫攻坚增添新动力的同时，也必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引擎”。在规划布局上，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要加强乡村旅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乡村振兴“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措施；在旅游开发中，注重旅游产业与村庄、村民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方面的融合互动，推进整体协调发展；在治理体系上，优化以利益分配机制为重点的乡村旅游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旅游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重视和保障农民分享旅游成果的权利，有效保障农民获得持续性收益。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紧扣乡村旅游的实践过程，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可行路径和长效机制，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19, (16).

[2] 孙兆霞. 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5, (03).

[3] 梁栋, 吴惠芳. 农业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基于江西林镇及所辖李村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1).

[4] 郭小聪, 吴高辉, 等.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 L 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5).

[5] 马良灿.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3).

[6] 黄国庆.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求索, 2013, (05).

[7] 荀丽丽. 悬置的“贫困”：扶贫资金资本化运作的逻辑与问题[J]. 文化纵横, 2016, (06).

[8] 蒋永甫, 龚丽华, 等. 产业扶贫: 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 (02).

[9] 于乐荣, 李小云. 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与益贫机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0, (04).

-
- [10]许汉泽, 李小云. 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对策——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03).
- [11]侯昭华, 宋合义. “顽疾”还是“误诊”? 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02).
- [12]胡振光, 向德平.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14, (04).
- [13]李小云, 苑军军.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02).
- [14]Galtung J.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71, (02).
- [15]Borgatti, Everett. Models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J]. Social Networks, 1999, (04):375-395.
- [16]Garrett Nagle.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M]. Waltonon-Thames: Nelson, 1998.
- [17]Friedman J R. 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2.
- [18]张康之. 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J]. 江海学刊, 2008, (01).
- [19]宋慧娟, 蹇莉, 等. 景区带动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机制及路径[J]. 农村经济, 2018, (05).
- [20]向玉琼. “中心—边缘”结构下政策过程的线性思维[J]. 党政研究, 2017, (06).
- [21][美]南茜·弗雷泽. 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 欧阳英,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2]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3-07(02).

注释:

1 全国重点扶贫监测点超三成脱贫人口依靠“乡村旅游”。见 <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9/0920/c41570-31363510.html>.

2 数据来源于朱德故居管理局提供的《朱德故居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汇报材料》《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扶贫达标说明》《省检景区带村扶贫》等材料。

3 脱域化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4 数据来源于朱德故居管理局提供的《朱德故居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汇报材料》《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扶贫达标说明》《省检景区带村扶贫》等材料。

5 数据来源于朱德故居管理局提供的《朱德故居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汇报材料》《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扶贫达标说明》《省检景区带村扶贫》等材料。

6 数据来源于朱德故居管理局提供的《朱德故居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汇报材料》《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扶贫达标说明》《省检景区带村扶贫》等材料。

7 数据来源于朱德故居管理局提供的《朱德故居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汇报材料》《朱德故里景区旅游扶贫达标说明》《省检景区带村扶贫》等材料。